

权力集中为后发国家提供体制路径

房宁

摘要：由于中国的历史、国情、国际环境以及我们发展的阶段，仅有对人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显然还是不够的，仅这一点还不足以支撑中国的崛起。作为一个后发国家，需要集中民力和民智，实现跨越性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二个方面。可以减缓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博弈，可以降低群体间的利益交换成本。中国的这个经验与模式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观。整个中国，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这样的变化。正是因为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很自然的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就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和发展，这是偶然的吗？似乎不像，因为中国作为世界上的大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民众多。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当中，获得持续的全面的社会发展，把它归结于偶然，或者只是归结到几个简单的因素，恐怕都难以令人信服。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很自然的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问题，利用中国人自己爱说的话来说就是“中国道路”（国外的人喜欢称之为“中国模式”，我们自己人喜欢称之为“中国道路”）。坦率的说，我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或者说中国模式已经初具形态。那么这条道路也就是中国发展、社会进步的制度体系。

由于我的研究领域是关于政治学的，所以我想从政治制度或者说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谈谈对中国模式的看法。应当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这个政治发展道路官方的表述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的具体表现是一系列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四大基本制度：一个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个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正是这“三统一”和“四制度”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政治发展模式的框架，这个表达属于政治术语。如果用学术术语进行解释的话我认为中国模式它的结构与功能是：集保障国民权利和集中国国家权力相统一的这样一种制度。这是这个制度的结构，也就是说在权利的配置上它一方面保障国民的权利，一方面又集中国家的权力。

所谓保障国民的权利就是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之下可以保障人民去追求个人的美好幸福生活，允许各种生产要素按市场规则进行自由的流动和调配，人民的权利，特别是私有产权，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障，人民的自由不断的扩大。这个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计划经济的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对于个人权利的保障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价值的转变，也就是说社会根本导向的一个转化。正像当年导致日本的崛起，1868年的明治维新造就了现代化的日本。明治维新中提出“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这样一个纲领，把日本从一个以世袭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的程度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从而使日本民间蕴藏的巨大的积极性得以焕发，使日本从一个千年中仰望中国的小国一举崛起并且称雄亚洲。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它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那种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那么正是这样一个社会价值的转变使中国人民当中蕴藏着的巨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了出来。这种积极性的发挥究竟有多大，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遍布中国城乡的沧海桑田般的巨变。我们与其为中国这种器物的变化而感到惊讶不已，更不如由衷地赞叹当人们摆脱了束缚，焕发出来他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之后所迸发出来的那种无限的创造性和活力。这个应该是中国的体制之所以获得成功的一个要点。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是一个曾经落后的国家，中国不仅要改变自己的面貌，而且还要追赶世界。那么作为一个后发的国家，它的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显然就不同于那些原发性的工业化国家，她必然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她必然要另辟蹊径。所以这就是中国体制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集中权力。**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她要追赶世界，凭借着按部就班的自然的发展是不可能追赶世界的，她会永远落在世界的后头，所以中国这种落后国家必然要实行一种战略式的发展，我称之为战略性发展，也就必须进行一种战略的规划，必须进行统筹的科学规划和设计，并且长时间的坚持，一以贯之地加以实现。也就是说要对整个的社会资源进行科学的配置，根据以往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合理的安排。说的更加简单一点，实际上就是需要有一种把人民的力量和智慧集中起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一点也是以前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做过的事情，在中国就变得更为突出。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有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保障了中国在发展当中可以集中资源实现其战略性的发展。中国60年特别是近30年的发展完全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划来进行的，所以中国才取得了如此之大的成就。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说中国的发展是由于两个积极性，一个是市场的积极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一个就是政府的积极性，有一个主观的努力，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坚持执行。具体的来说这种战略发展第一主要是政府进行统筹规划的原始积累，为工业化产业化提供初始资金；第二是

因地制宜，并考虑到国际经济环境来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策略，这就包括了我国国家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这样的一系列政策；第三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提供一些基础设施，由政府来进行国土规划、国土整治和提供基础设施，包括铁路、水利、工业园区等等，还有一个就是提供一个法制的环境，当然也包括对人们进行在教育、科学知识的普及、树立人民的法制观念、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等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正是由于这样一些政府的努力所以也使得中国有一种节约化的、有效配置的快速发展。这样的一种发展它需要一种比较集中的体制，也就是说需要有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一个政治核心来做出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的决策。由于是一次性的委托（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概念，这种一次性的委托人民是有授权的，而且授权时间比较长，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以后还会有很长）这使得在授权之后的决策过程中交易成本降到了最低。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相比她的效率之所在。西方在民主政体之下它有数不清的授权过程，并且它是多中心的，所以在每个重大决策上都有大量的博弈，使得交易成本很高。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倒不大，也许还是个优点，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不行了。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她所采取的这种体制是合理的，是有效的。当然这点现在也无需多说了。这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制度奥秘。

有一些人经常站在西方的角度，或者以西方的经验来套裁中国，所以经常批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中国这样的一个体制恰恰是适合于中国现阶段历史进程的，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尽管这个制度当中由于权力的集中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我刚才讲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题，是这个更大的道理管着那众多的小道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地肯定我们这个制度的考量。如果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来讲，我觉得中国的这样一种体制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它是对整个世界的贡献，可能那样还不太谦虚，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这样的体制给西方以外的世界提供了经验。所有西方以外的国家，甚至包括俄罗斯，要想实现民族的振兴，要想赶超这个世界，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恐怕都可以从中国的经验当中学到一些什么。我想这是中国对西方以外世界的贡献，甚至可以说，如果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上也许这不是一种贡献，也许这对西方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特别是如果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经验越来越得到世界的重视，中国的模式越来越得到肯定的话，那么恐怕世界上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向中国学习。随着这些国家的发展甚至是崛起，我想在整个人类社会盛宴的那块儿大蛋糕上西方所能够切到的就会少起来，而广大西方以外的世界得到的就会越来越多。中国的这个经验与模式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